



齐白石画中的荔枝(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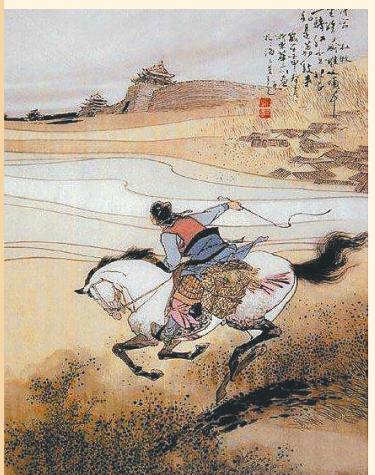
在海南，每年一过了“五一”长假，爱吃水果的朋友们就开始坐不住了，因为不久之后，就是荔枝上市的季节，他们准备在荔枝上市的第一时间，将其带回家中。而更心急的朋友们则会联系熟悉的荔枝园，在上市之前就摘一些先尝为快，即使冒着炎炎烈日，晒脱了皮也值得。

在众多水果当中，若论味道，荔枝可以拔得头筹，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种美味的水果却有很强的季节性，并且耐贮存能力极差，不仅如此，荔枝还经常出现“大小年”的情况，产量不甚稳定。荔枝季一年仅此一次，错过就要再等一年，试问，有谁在这些红色的小圆球面前还能坐得住呢？

不仅如此，荔枝还是一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水果，从汉代开始，各类文学作品中就经常出现“荔枝”的名字，而杜牧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更是妇孺皆知。吟诵着古人留下的诗句，不由对这能博得妃一笑的荔枝的出生地产生无限的好奇。



杨贵妃图(圆山应举 绘)



贵妃荔枝运送图(国画)

## 贵妃荔枝产自何方？

只要一提到荔枝，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杨贵妃，虽然杜牧诗中不乏贬义，但是杨贵妃与荔枝的缘分却是割舍不开了，而杨贵妃吃的荔枝到底产于何处，这又引起了一桩史学公案。

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进贡给杨贵妃的荔枝是产于巴渝一带。一说起四川和重庆，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辣椒和柑橘，而对此地所产荔枝不甚知晓。然而，川渝确实出产荔枝，而且由来已久。四川很多地名都与荔枝有关，“荔枝湾”“荔枝桥”“荔枝坡”“荔枝林”等，不胜枚举。而白居易在忠州（今重庆忠县）任太守时，曾在家中大量种植荔枝，并留诗为证：“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诗中，白居易感叹荔枝结果太慢，十年之后，等自己手植的荔枝结了果，自己还不知道身处何方不能品尝得到。

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川陕之间的秦巴古道虽然崎岖艰险，却为往来南北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据历史学家考证，杨贵妃所吃的荔枝正是由这条古道送来的。早在宋代时，就有史料记载，在川陕之间曾有一条“开元时涪州进荔枝路”；而在元代的记载中，更是将这条路的来龙去脉讲得十分清楚，此路为“王莽所开，唐明皇荔枝路”；到了清代，有记录四川风物的著作中称：“贵妃嗜涪州荔枝，岁命驿致，故东坡诗云‘天宝岁贡取之涪’，今子午谷尚有荔枝道”。蜀道自古而有之，而唐代玄宗因为贵妃喜食荔枝，则将之打造成一条荔枝专供路线，其背后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

杜牧诗中杨贵妃所食的荔枝产于蜀地，基本已是定论，但是，除了蜀地之外，杨贵妃有没有可能吃到其他地方进贡的荔枝呢？当然可能。有记载称，当年“南海与涪州并进荔枝”，杜甫在一首回忆开元盛世的诗歌中也写到“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可见，当时不止蜀地一处在进贡荔枝，更远的南海（今广东一带）也有进贡，甚至，两广进贡荔枝的历史比川渝更为悠久，有记载称“自尉佗献汉高帝始”，也许是路途过于遥远，到了唐代，岭南的荔

■ 吴辰

枝竟不为人所知，而随着杨贵妃喜食荔枝，南海的荔枝才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有意思的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宰相张九龄曾经写过一篇盛赞荔枝的文字，称：“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乃熟，状甚瑰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尝盛称之，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如果细查张九龄的身世，就会发现，这位宰相原籍广东韶关，这样盛赞家乡的荔枝，多少有点为家乡“带货”的意思，但是，从张九龄的字里行间也能体会到一种无奈——山水重重，这种在故乡极为平凡的水果在长安竟珍贵如斯，连西掖（中书省）内诸公也无人知晓。在唐明皇专门为杨贵妃开辟了“荔枝道”之后，南海荔枝也大量出现在诗人的作品中，也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张九龄的功劳。

## 古人如何保鲜荔枝？

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们都知道，荔枝在诸多水果中可以说是最不耐保存的了，稍微吃得慢一些，其味道就会大打折扣。白居易在那篇著名的《荔枝图序》中说：“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荔枝的这一特点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过。很多人都希望荔枝能够久藏，但实际上，荔枝之所以被称作是“荔枝”，正是因为其储存时间极短。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列举了很多水果的名称，其中就有“苔离离”一句，此处“离离”即是现在的“荔枝”，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正是因为其在进贡过程中要带着大量枝条一起运输，只要一从枝头离开，就会变质腐坏。

古往今来，人们为了吃到荔枝可以说是脑洞大开，发明了各种各样、靠谱不靠谱的荔枝保鲜技术。据说，最早的做法是将刚摘下的荔枝连同枝叶一起装进新砍的竹筒里，然后用竹叶混着泥封好，可以保证数日不坏。这一方法流传甚广，我们都知道宋代苏东坡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他的表哥文同也一样爱吃荔枝，他在一首诗中记载了当时运输荔枝的方法：“筠箠包荔子，四角具封印”，“筠箠”就是竹箱子，而“相前求拆观，颗颗红且润”，经过长期运输，打开竹箱，荔枝色且未

变，可见，用竹器保鲜荔枝的方法是比较靠谱的。而明代有人称用这种方法储藏荔枝“可藏至冬春，色香不变”，则不知是不是夸张之语了。

到了后来，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现代“荔枝罐头”的做法，“就树摘完好者，留蒂寸许蜡封之，乃剪去蒂，复以蜡封剪口，以蜜水满浸。经数年，味色不变，是予终岁皆有鲜荔枝之饱。”这段话的作者是明末清初广东著名诗人屈大均，为了能随时吃到荔枝，不惜用当时价格不菲的蜂蜜去浸泡，可见荔枝魅力之大。

而历朝历代，都流传着一种颇为硬核的荔枝保鲜技术，即直接把荔枝树从南方运往北方，有传说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荔枝即是这样被运到长安的。有人为杨贵妃设想过这样一条荔枝运输路线：“以连根之荔，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骑至华清宫，则一日可到达”。还有传说天津的“卫青”萝卜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当初为皇帝送荔枝时用的就是直接将整棵荔枝树运到北方的办法，到了天津，再把荔枝摘下送进京城，所余泥土带有荔枝香味，种出的萝卜也格外好吃。林林总总，不知是真是假。而有人还提到过一种类似的方法，即在荔枝将熟时，连枝带果地砍下，扦插进被同样砍得只剩根部的芭蕉中，让荔枝靠着芭蕉的养分继续生长。由于芭蕉生命力顽强，运输途中不易死亡，而荔枝也靠着芭蕉的养分得以成熟。在我看来，远比将整棵荔枝树运至北方的做法靠谱得多。

长久以来，正是因为交通的不便，海南荔枝并不为人所知，而海南本身就是荔枝的原产地，其气候优势也使海南荔枝的品质和产量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如今，交通的发达以及保鲜技术的进步已经能让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吃到新鲜的海南荔枝了。海南不但有着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羊山荔枝种植系统，还在不断开发出新的荔枝品种，目前，除了常见的妃子笑、白糖罂、大丁香之外，永兴火山荔枝王、澄迈无核荔枝等优良品种已经量产面世。在这个荔枝的季节，来海南品味各种荔枝，绝对称得上是人间难得的乐事。

## 张元济的气节

■ 江舟

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爱国实业家。在谈到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史时，不能不提到商务印书馆，而谈到商务印书馆时，不能不提到张元济先生。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七七事变”，侵占了我国半壁江山。上海沦陷后，日军在上海烧杀抢掠，欺凌国人，张元济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慨，写了一本书，叫《中华民族的人格》，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二十四史中选录了许多我国历代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他们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迹，表达了张元济先生的爱国心声，为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后来，这本书惹恼了日军，日军以“抗日”的罪名，查封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凡是商务印书馆印有“国难版”字样的书籍，一律不准出售。

商务印书馆当时在中国出版界久负盛名，日本占领军有意拉拢张元济，希望张元济能够为所谓的“中日亲善”宣传发挥一定的作用。有一天，日本占领军派了一名军官到张元济的寓所去拜访他，年逾花甲的张元济在一张纸上写了“两国交兵，不便接谈”八个字，叫儿子张树年交给这个日本人，拒不接见。几次下来，日本占领军只好作罢。

张元济和蔡元培是同科进士，私交甚笃，蔡元培和汪精卫都是“西山会议派”人士，通过蔡元培，张元济和汪精卫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汪精卫在青年时期风流倜傥，1901年曾经因为暗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轰动全国，而他自撰的绝命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们传诵。张元济曾经对汪精卫很有好感，对汪精卫的“革命气概”很是欣赏折服。他对蔡元培表示过，他愿意为汪精卫效劳，如果汪精卫需要什么书籍之类的东西，他将尽力给予提供支持。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了汉奸，充当了日寇卵翼下的南京汉奸政府主席，张元济气得写信痛骂汪精卫，从此以后再也不理他了。1943年冬天，日军将商务印书馆的《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两部书的铅皮版全部抢走，拒不返还。当时有人劝张元济为了商务印书馆的利益，去往汪精卫疏通联络，也许这两部书宝贵的铅皮版能够完璧归赵。但是，张元济宁可忍受巨大的损失，绝不肯低头去找汪精卫向日军求情通融。

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有自己所坚持的信仰追求、道德准则和价值尺度。张元济作为爱国的出版家和实业家，始终心怀国家和民族，爱憎分明，道义凛然，这正是一个真正中国人的精神和灵魂之所在，也是鲁迅先生所赞赏的，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 季羡林“做人”

■ 钱永广

做学问和做人，是两回事。很多人做学问很好，但做人却不好。“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季羡林，则是两者兼具。

就像年少时我读卢梭的自传《忏悔录》，作者勇敢地把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完全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并宣称没有人敢说：“我比这个人更好！”我深深地为作者那种真实做人的崇高品格所叹服。如今许多年过去了，当我读到季羡林《风风雨雨一百年》这本书时，我不禁为大师的曲折人生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感动得涕泪泗下，我的灵魂，我的情感，也被大师的品格所感染，并让我重新想起卢梭这句话：“没有人敢说，我比这个人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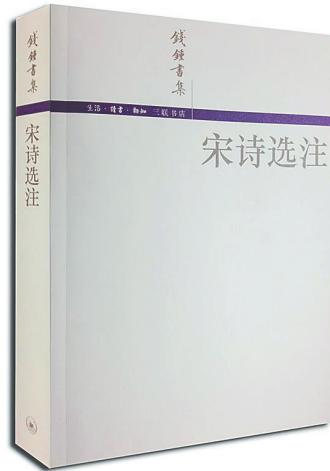
在《季羡林自传》这本书中，他总是要求自己做一个积极的人。他说，即使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他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

他坦言，在他的散文和杂文中，他的思想感情有前后矛盾的现象。这些文章，他都不会删改，而是全部保留下来。他说，不管现在看多么幼稚，甚至荒谬，他都不会加掩饰。他从不回避自己的缺点。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

季羡林常说，不完满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

## 钱锺书追“红”逐“绿”

■ 杨建民



钱锺书作品集《宋诗选注》

钱锺书《宋诗选注》，入选了一首为人喜爱传诵的名诗（多首有名的诗并没有入其“法眼”被入选），南宋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字眼上很简单的一首诗，似乎用不着多解释。可这首诗的后边，钱锺书却有一节不短的追根溯源。他开口便指出：此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陆游这首诗这么写的：

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靉靆。

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

果然，后面两句几乎套用，最后句子只差一字。可相较之下，钱锺书以为叶绍翁的诗：“第三句写得比陆游的新警。”可这话说似乎还不够，钱锺书又从另一位宋代诗人张良臣集子中寻出一首《偶题》来：

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

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

整个描述跟叶绍翁诗更像了。可钱锺书以为：“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追到这里，在笔者看，已经够了，可钱锺书还没过瘾。他还往上走，以为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譬如温庭筠有一首《杏花》，其中两句是：“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还没到根。钱锺书又寻出吴融的《途中见杏花》中的两句：“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与叶诗这么一致，该到头了吧？不，吴融还有一首《杏花》，其中两句：“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哦，原来叶绍翁的诗句如此曲折而来。

这首“红杏出墙”之外，《宋诗选注》还选了王安石一首说“绿”的诗，我们不妨拿来比对看看。诗当然是好诗，可在笔者看来，钱锺书选这首诗，大半是因为其中一句。此诗名《泊船瓜洲》，四句：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不算难懂，所以钱锺书仅在两处加注。一是题目中的“瓜洲”，注这样写：“在长江北岸，跟镇江——‘京口’——相对。这是王安石想念金陵的诗，钟山是他在金陵的住处。”这样一注，诗的内容大半开朗，好理解之外，对诗人的感情也容易把握了。至于诗中内容文辞，钱锺书仅仅给了一个注释。这个注释，其实只给了诗中一个字——“绿”。

一眼看去，“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十分引人。它几乎让我们一眼看遍了水乡江南那充满无限绿色的景致。其中“绿”字，用得真好，既是本色形容词，又起了动词作用，不仅简约，

且使“绿”有了动感，有了鲜活“烧”眼的效果。钱锺书的注释，也是冲着“绿”字而来。他笔下更多，是关注此字的来历：“这句也是王安石讲究修辞的有名例子。据说他在草稿上改了十数次，才选定这个‘绿’字……”据谁说呢？洪迈。洪迈有《容斋随笔》，十分有名。他还是宋朝人，所记宋人事，大抵比较靠谱。《容斋随笔》这样说此句：“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一个字居然用了这如许心事：“到”“过”“入”“满”……意思虽不错，可味道较“绿”字差得很远。这样的记述，虽然可以看出王安石的精心，可博学的钱锺书却读出了别一番味道：“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诗里又说：‘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这是说王安石也很得意这个“绿”字，所以好句不在多，在其他诗中再说一次。虽然诗人得意，可钱锺书此时，却要对此字来历，下一番福尔摩斯的探案功夫。他说：“但是‘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引了这么一长串，钱锺书发问了：“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意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追溯到源头，一通究诘的钱锺书显然一脸得意，可心事被戳穿的王安石，并不乐意买账也很困难。

（据《光明日报》）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韩琦版刻像

古装大剧《清平乐》热播，北宋名人再次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剧中，北宋“三朝贤相”韩琦与好友富弼分道扬镳，有“黑化”之嫌。其实，韩琦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比欧阳修更突出，欧阳修也是他极力举荐的。《宋史》评价他：“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

1008年生于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的韩琦，字稚圭，“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20岁考中榜眼）。”从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等冷门职务干起，28岁拜“右司谏”（正七品谏官）。任谏官3年，他屡次犯颜直谏，“前后七十余疏”，严厉抨击“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尤其他“连疏时任宰相，参知政事（副宰相）庸碌无能”，结果导致“四个庸官同一天被罢免”成为当时特大新闻，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一时名京华”。可见，韩琦30岁左右就以至真至纯的高尚官德赢得了民心。

韩琦虽为文官，却是北宋朝廷为数不多的“鹰派”人物，他极力主张加强边防军事力量、主动反击西夏、契丹的侵略。《宋史·列传卷七十一》载，康定元年（1040年），从四川“活饥民百九十万”归来的韩琦“进枢密直学士（正三品），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西夏元昊大举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军“三川口大败”后，韩琦力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加强防守”的策略与他“先发制敌”的战略截然相反，但经历几次贸然出击失败后，韩琦信服了范仲淹的“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战争中，韩琦主动承担责任的官德在“好水川之战”中也表现无疑：“琦悉兵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趋德胜砦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及行，戒之至。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中计大败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夏竦派人“收散兵”，从任福尸体上找到韩琦写给他的军令，就上奏朝廷战败的责任不在韩琦，但韩琦“亦上章自劾，犹夺一官”。

宋夏议和后，出任枢密副使的韩琦与参知政事范仲淹、另一位枢密副使富弼一起推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嘉祐元年（1056年），因“新政”遭旧派极力反对而被贬的韩琦重回京任职，当一个月三司使就升为枢密使，第二年又出任宰相。然圣眷正隆、大权在握的韩琦并未报复“反派”，即便对先前弹劾乃至诬陷他的政敌也都网开一面，容人之量可见一斑。

从宋仁宗到宋神宗，韩琦“执政三世，或病其专”。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不赴文殿坐班，专权跋扈。尽管宋神